

道德教育如何应对社会原子化的挑战

■汤迪

摘要: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了社会原子化的隐忧,而近年互联网的发展更是加深了人际关系的疏离。为了帮助人们摆脱社会原子化的侵扰,道德教育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与时俱进,应对挑战。从社会思想的角度来说,社会原子化的成因是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美德伦理学由于其强调整体性和社会性的特点,适合作为互联网时代道德教育的一种补充思路,以修复人际交往、稳固社会,引导人们走向正常的社会化。

关键词:社会原子化;道德教育;互联网时代;美德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G40-0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20)8-0066-06

作者简介:汤迪,男,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从事伦理学研究(湖南长沙 410081)。

DOI:10.16477/j.cnki.issn1674-2311.2020.08.009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无论是传统的家庭为基础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个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这一现象有很多种描述,如社会原子化、流动现代性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同一个现象:个体的游离。

所谓社会原子化,主要是指社会转型期因人类社会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社会失范等社会危机。有的学者把社会原子化表现归纳为以下三点:其一,伴随着现代化或社会转型的过程,人们开始从各种共同体中被解放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人际关系开始疏离;其二,个人直接面对国家,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初级社会组织被破坏,个人与国家间的连接不通;其三,各种社会制约因素被消解,规范失灵,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人将最终工具地看待社会。^[1]由于社会转型以及互联网的发展推动并加深了人的疏离,我国也面临着社会原子化的侵扰。因此,道

德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应对挑战。美德伦理学由于其强调道德的整体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在修复人际交往,优化社会关系,应对社会原子化的挑战方面有独特作用。

一、世界各地广受社会原子化问题困扰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原子化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开始显现。自欧洲封建时代末期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起,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和传统的集体生活,成为流动的劳动力,正迎合了其后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社会原子化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从英国开始蔓延到欧洲大陆,之后更是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扩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东亚、拉美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在数十年内走了欧美国家两三百年的路,社会急剧转型之中种种问题相互影响、叠加,社会原子化就是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

日本多年来深受社会原子化问题困扰,这一现象在日本被称为“无缘社会”,是2010年的纪录片

《无缘社会：无缘死的冲击》中归纳的一种现象：一部分人与家庭关系疏远，对家人的亲近感低（无血缘）；远离家乡，对家乡与生活地的认同感都较低（无地缘）；缺少朋友、没有稳定的工作与职场关系，缺乏社交（无社缘）。这样的年轻人无法融入社会，老年人则孤独地死在家中无人知晓。此外，自杀是一种最彻底地抛弃人世的“缘”的做法，而日本的自杀率常年在世界前列。据日本警察厅的数据，2019年有20169人自杀，其中11345人为无职业者，这一万余人中又以靠退休金或失业保险为生的人最多，占25.19%；自杀者中东京人数最多，超过2000人，东京都市圈的埼玉和神奈川也在前五。^[2]可见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自杀现象更严重，其背后是更广泛的“无缘”，也就是社会原子化的危机。而被社会淘汰的失业者、退休者等社会边缘人是最容易受到此危机影响的群体。

师艳荣总结了几点“无缘社会”出现的原因：一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传统的家庭和单位的依赖关系解体，新的组织关系尚未建立；二是随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推进，个人主义膨胀；三是社会差距的扩大，底层人民难以上升，被迫与社会无缘。^[3]上世纪末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邪教吸收会员就瞄准了这些“无缘”的人，或者是把人骗来后强迫其与家庭社会断绝来往进行洗脑。除了邪教，社会“边缘人”也容易加入黑社会等组织以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吕方、梅琳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社会成员组织化程度、参与和影响公共事务的能力大相径庭，尤其是边缘群体在利益捍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制度化渠道，往往采用一些越规的做法。”^[4]边缘群体缺乏有效的发声渠道就会走向极端，或是向内爆发就此沉默，脱离社会；或是向外爆发引发社会动荡。这样的现象不仅是日本的威胁，日本的传统的文化与社会组织方式是以古代中国为蓝本的，而且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仍低于日本，因此日本在现代化中经历的危机很有可能会在中国重现。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如今来看经过一百余年的磨合，社会原子化现象已经没有那么严重，社会原子化导致的邪教、黑社会等问题并没有东亚、拉美地区这样突

出。在东亚、拉美这样的相对欧美而言的新兴经济体，社会转型导致思想迅速转变，加上国家权力难以达到基层而造成了基层的权力真空，必然要有一个基层组织来充当人和社会、国家之间的中介，同时也为游离的人们提供归属感。如在韩国这个中介主要是教团，在巴西、墨西哥等国主要是黑社会或贩毒团伙。而在欧美，社区、工会等合法的中间组织承担起了连接人与社会、与国家的任务。这就意味着人们有正当渠道发声，更大程度上避免上述的边缘群体越规维权的现象。

在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英国社会原子化就很严重，这是其经济最强大、工业化发展最快，也是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期。彼时自由主义盛行，资本的扩张不受道德的约束，以狄更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等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期底层的人与社会的脱节。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时期产生，针对性地考察、批判了英国日益严重的“异化劳动”现象。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5]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工具地看待他人助力了社会原子化。而自由主义的疯狂生长引起了共和主义的反弹，最后达到一个相对平衡。虽然近年来德国、英国等都发生过“独狼式”恐怖袭击，这是恐怖主义和原子化的个人相结合的产物，但总的来说目前欧美国家的社会原子化问题相对于日本和中国并没有特别尖锐，因为它们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这也提示我们，社会原子化虽不能避免，却是可以抑制的，而且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旧的单位制度解体，人与单位不再绑定，人才开始自由流动，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社会原子化渐渐开始。加之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思想的进入，社会思想开始急剧转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人们造成了一定影响。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推翻公论，颠倒黑白。由于过于强调个体的叙事，历史虚无主义者一方面将历史视为偶然性的累积，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割裂历史传承对当代的影响；一方面随意发挥主观因素，认为历史只是

如何阐释的问题,解构主流价值观。而近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会加速信息传递、观念变化和社会转型,从而加深中国的社会原子化。

二、互联网加剧社会原子化

移动互联网已经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网络时代,人们社交的主要方式除了传统的面对面的社交,还有网络社交。网络社交的特点是匿名、快速和广阔,这些无疑都是网络交往的优势。但是从负面影响来说,匿名的社交使得人的负面情绪更容易爆发;快速的社交使得不良、不实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广阔的社交使得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比传统的关系而言更为浅薄,更容易破裂、转化。

由于人的精力有限,若一个人用于社交的时间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其社交对象的数量与和用于每个对象的时间是成反比的。在传统的面对面社交模式下,限于人的沟通、移动手段,一个人一般只能与自己生活圈、工作圈中较少数量的人保持较深关系,也可能有一定数量的通过书信、邮件、电话保持的远方的社交关系。而在网络社交中,人可以与任何距离外的人建立联系,距离的影响减弱。一个人可以完全不出门,与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却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熟人;可以不接触周围的生活圈,依靠电商与物流业生活。网络社交工具,从初期的BBS、论坛到现在的微博、微信朋友圈,都是留言板式的交流——人向一定的群体或者全体广播其信息以吸引他人前来交流。与电话、短信等交流方式相比,留言板更指向不特定的对象,也就意味着社交意愿低、能力弱的人可以选择避免交流,长此以往,社交能力强的人愈发地强,社交能力弱的人愈发地弱。

一项关于95后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现状的实证研究中揭示了一系列网络社交引发的社会原子化相关现象:关于“是否因为网络社交而感到现实的空虚”,只有24.94%的受访者表示“否”;随着出生年份越来越接近2000年,关于“网络社交与现实社交是否一致”的回答越发倾向于不一致,而且越发

倾向于在社交软件中使用屏蔽他人的功能,1999年生的受访者中只有11.11%的人从不屏蔽他人。^[6]这显示出随着网络社交的发展,人们寄希望于网络社交来弥补现实社交的不足,但又深深地不认同二者能够统一,形成撕裂,进而感到空虚;且在网络交往中人越来越倾向于放弃说服和相互理解,而是把持不同观点的人排除在自己的社交圈之外。现实交往与网络交往的撕裂使人的行为越来越无法保持同一性,现实生活受到法律、道德、规则、人情等重重约束,到了网络社会就会报复式地爆发出来,使得网络社交中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脆弱。

在这样的网络交往中,人可以在匿名性的保护下为所欲为而不需负责,那么他人对于我只是物,而不是同等具有主体性地位的人,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回启蒙运动之前。绝大多数的网络交往里,人对人只是无面的人,是不特定的人,只是一个人的符号,是可以被以被任何人替代的。面对无面的人,人就会把自己的面孔投射上去,对不符合自己期待的人进行诋毁,党同伐异,最后形成了网络民粹主义——人们通过二元对立、反智主义等非理性的话语试图从传统的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权威部门等那里争夺权力。张爱军等认为,在这一大背景下,网络成为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第二世界”,打破阶级、财产、年龄、身份等界限,尽情狂欢,并对一切神圣或日常的事物予以颠倒、亵渎、戏仿。在情绪化的表达中,道德底线被突破,主流意识形态被解构;美化罪责、穷人无罪等反话语泛滥。^[7]随之而来的是道德规范的失灵,人对人是客体、敌人和工具。

简而言之,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个人表达的途径极大拓展,为个人主义提供了生长的土壤;极为丰富的社交反而使得人际关系变得脆弱;网络匿名性保护下,道德规范不再值得敬畏,人将工具地看待他人和社会。这些都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特殊的、更深层的社会原子化现象。

三、应对社会原子化,道德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

涂尔干说过,“教育就是一种使年轻一代系统

地社会化的过程”^[8]。原子化是社会化的缺失,其中固然有客观因素的推动,但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治本之道应该是通过教育引导人们走向正常的社会化。

社会原子化的成因,从社会思想的角度来说,是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在欧洲的反封建斗争中,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在西方主要经济体中最终形成了新教伦理——以上帝赋予人的“天职”为核心,宣扬个人主义,鼓励进取,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的新教伦理与自由主义传播到全球。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引入国外资本和生产方式,随之而来的是新教伦理。即使在中国这种思想并没有宗教基础,但它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到如今也深刻地影响了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此外,近代哲学大国德国和法国自19世纪以来就经历战乱,又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风暴中心,哲学家们深感“形而上学”追求的普遍和稳定的规则无法实现,唯意志主义与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尼采否定现存规范,要用个人的意志来立新的法;海德格尔则把“烦”“畏”等私人的情绪化的状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思考;萨特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也曾流行一时,更多的人开始思考作为单个人存在的方式而非群体中无个性的一员。

目前的研究多是从防范的角度谈社会原子化,然而社会原子化不仅是一种现象,还是一种必然。从社会存在的角度来说,随着科技进步、人的沟通手段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局限于熟人社会。过去限于沟通手段的落后,人只能与本地、本单位的人保持紧密的社会关系,加上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传统,不鼓励人口流动。而现代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形式的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必须面对陌生人,因此熟人之间的联系相对地就被削弱了,个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然而,人是社会的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如何孤立也无法从社会中剥离出去。问题其实在于人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的缺失,我们不必过于害怕社会原子化,关键是要重建个人和社会间的连接。不是重新将人捏合起来,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或者宗族社会,而是由人与人之间自由地联结形成新的社会组织,

人们有丰富的选择,既符合当代社会活动的需求,又不至于让人与社会脱离。这既需要社会提供外部条件,也需要个人对社会生活的肯定,而道德教育要做的就是解决内因的问题,克服过度的个人主义,让人重归社会。

四、美德伦理教育在应对社会原子化中的作用

我国当代的道德教育多是以规范伦理学为指导的,因为规范伦理学是古希腊—先秦轴心时代结束后的伦理学,尤其是近代伦理学的主流。所谓规范伦理学,就是试图得出一种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并将其教给他人,使人成为道德的人。规范伦理学回答的是“应当如何”,而还有一种美德伦理学回答的是“为什么应当如此”。显然,人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才能真正信服某一道德准则,而说明这一理由的道德心理等范畴,都是美德伦理学的范畴。规范伦理学指导下的道德教育易于操作,却容易沦为教条,成为弱化的法律。规范伦理学不讨论道德心理,但是它也必须要有个理由来支撑起规范,于是它预设好了一个确定的理由,那就是对义务的敬畏;功利论是出于对“实现最大功利”这一义务的敬畏;而道义论是出于对“服从绝对命令”这一义务的敬畏。而此义务必须能涵盖所有的情境,才能足够令人信服。所以,在规范伦理学那里,对义务的敬畏挤占了其他一切道德心理的位置,成为唯一的理由,因此,规范伦理是一种强加的教条,但是它用“规范是理性的产物”说服了人们接受规范。但理性主义的一大问题就是,理性能力是有限的,而理性的野心是无限的。规范是有限的,但是实际生活中,道德情境是无法穷举的,如果人没有自发的道德,只有外界强加的教条,那就必然会在某个被教条遗漏的地方得出违背道德直觉的结论。如伯纳德·威廉姆斯举过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规范伦理学导致的僵化:若甲答应去看望乙,但是当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而爽约。唯一合理化的辩护就是只有更严格的义务能打败义务,而不是出于什么其他的东西。^[9]这符合道义论的观点,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怜悯都被对义务的敬畏取代。更严重的情况是,人可能会沦为执行道德行为的机器,其看似道

德的行为并非出于任何善良的品质,而是对义务的敬畏。当然,规范伦理学指导下的道德教育教出来的人并非一定是不知变通地遵守规范的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但强加的道德总归不如自发的道德灵活适用。

美德伦理学是一门由来已久的学说,研究的是如何让人自发地成为道德的人。先秦的儒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都是美德伦理学的代表。而美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始于对现代性的反抗,代表人物为麦金太尔等。传统德育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大学》八条目是儒家道德教育的纲领。其中,前四个“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个人道德,后四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公共道德。《大学》中以修身为八条目的核心,显示出传统道德的两个面向:向内提升自己的个人道德修养,向外在与人相处中发挥自己的修养。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在传统德育之中是统一的,有着道德(个人修养)和伦理(社会责任)两方面。而麦金太尔主张培养人的德性来应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麦金太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在不同片段中呈现出不同面向的碎片,人整体的德性失去了空间,职业道德等规范伦理的兴盛使得人的德性衰退。^[10]假设有一个推销员为了给笃信佛教的客户推销某物,欺骗客户说此物由某高僧开光。从推销员的职业道德来说,只要卖的商品没有价格和质量问题,他可以问心无愧。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说,这样的欺骗绝不合乎道德。如果人的生活、思想被切割成片段,那么就会出现他在扮演每一个角色时都是道德的,但整体来看是不道德的悖论。因为这类规范伦理只要求人表现得道德,至于人自身是否道德,它不去评价也无法评价。因此,麦金太尔希望恢复美德伦理学的地位,而要培养人的美德,就要重建不那么现代化、不那么原子化的社群,在社群生活中、实践中培养美德,重塑人整体的道德,应对现代化危机。相对于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的特点就是重视整体性与社会性。

陈开林总结了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对中国德育工作的启示,包括道德教育应注意回归“日常生活”(指每个人都在从事的自在的、重复性的生活领域);重视传统伦理文化;注重教学相长、以人为

本,克服传统德育将学生作为知识受体的局限性;等等。^[11]其中回归日常与以人为本这两点很重要。回归日常,即是要反对无限追问极端情况,无限追问最终会撞上理性极限的墙壁。对于有德性的人来说,无论什么极端情况都能做出适当的抉择,不必追问其依据,规范是无法穷尽的。以人为本即是要把人当人,是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道德人,考虑到人的差异、情感、能力等,允许人有道德上的不完美,避免过于苛刻的道德评价。就拿规范伦理学最常见的电车难题来举例,电车开到了岔路口,一侧铁轨上绑着一个你的亲人,另一侧绑着两个逃跑的死刑犯,如果不去动岔电车就会撞上你的亲人。这样的情况无论经典的功利论还是经典的道义论都要求你让电车去撞自己的亲人,但是谁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远离日常;根据规范做出的选择太残忍,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选,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道德。规范是必要的,但是人不能只靠规范活着。

简而言之,规范伦理学的思路是人做了好事,因而成为好人;美德伦理学的思路是人先成为好人,那么做的都是好事。教育要以人为本,那么道德教育应该坚持的总目标是培养有道德的人,而不是增加道德的行为。无论是康德主义、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近代哲学一直坚持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不是实施道德行为的工具,不是做道德抉择的工具,而规范伦理学指导下的道德教育,多把人作为被灌输的对象,灌输的是道德的行为而不是道德。甚至规范伦理学内部,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分歧由来已久,无法在规范本身上达成一致。规范伦理学为了讨论出最普遍的、置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不断地提出各种极端状况下的思想实验(如电车难题),反而有些舍本逐末,忽视了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过的都是日常生活。

可见规范伦理学内部无论如何争论,都无法跳出规范伦理学的框架。它试图将规范赋予人,却无法得出一个毫无疑义的规范。更适合治本的路径是美德伦理学——以培养有美德的人为目标,传授规范只是培养人的德性的手段之一,这样培养出的人自然能在各种情境下做出道德的判断。

那么美德伦理学何以能够应对社会原子化的

危机?

首先,美德伦理学起源于与现代社会迥异的古代小邦国,复兴于反现代性的斗争之中,它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也因此可以跳出现代社会对其进行反思。此处现代社会不是指现代的社会,而是以现代性为特征的社会,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公共—私人领域的分化。公共领域由理性主义的政治和法律管理,伦理学被放逐到私人领域,而且私人领域随着公共领域的膨胀在不断地萎缩。这就意味着公共性与理性极大地挤压、侵入了私人的、感性的领域。熟人社会在我国曾经过于广大,以至于家国一体,而在现代性的挤压下,可能会变得过于狭小,以至于连家庭也由理性的算计统治。在家庭的伦理中,爱才是首要原则,即使是理性主义哲学巅峰的黑格尔也这么认为。人至少应该在家庭、学校、邻里等相对而言的熟人社会中培养德性,再进入社会,用成熟的德性应对陌生人社会的挑战。法律是理性在陌生人社会的体现,它只是社会的最后底线,如果人只会用理性来解决一切,以不违法为底线自我要求,人性、文明与温情将成为奢望,人与人相异化将无法避免。

第二,美德伦理学要求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实践以培养德性,有利于德性与社会性的互相助益。教条的灌输不需要实际的情境,只要想象的情境,在想象中总会有意无意地忽视一些现实条件,而使得道德在想象之中自我证成。这样想象的道德在实践中一旦遇到变数就会出问题。陈真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认为能够选择“中道”(把握分寸)的品质就是美德,而对“中道”的把握需要实践智慧而非规则^[12]。实践智慧区别于哲学沉思,必须在实践中获得、证成,而实践必须有具体的社会条件。人在社交中实践以获得德性,在德性的指导下更好地与人交往。毕竟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逃避社交虽然能在规范伦理的意义上避免大多数的不道德,却令人与他人、与德性渐行渐远。

尽管如此,回到古希腊或者先秦的美德伦理学

是不可能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同,复古只能是倒行逆施。强调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性并非要彻底反对规范伦理学,不过是试图在规范统治的现代社会中保留一些私人的、感性的领域,给人以循序渐进地培养道德的空间,克服近代偏重规范伦理导致道德的结构失衡的问题,避免整个社会被公共性和理性吞没,变成机器。

道德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回应时代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应对时代的挑战。在社会原子化隐忧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可以期待以美德伦理学为指导的道德教育来弥补过去规范伦理学主导下产生的种种问题,更好地修复人际交往,稳固社会,克服社会原子化弊端,缓解社会转型和现代化问题叠加的压力。

参考文献

- [1]田毅鹏. 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J]. 社会科学, 2009, (7):72.
- [2]令和元年中における自殺の状況[EB/OL]. https://www.npa.go.jp/safetylife/seianki/jisatsu/R02/R01_jisatuno_joukyou.pdf. 2020-04-20.
- [3]师艳荣. 日本青少年“无缘化”现象解析[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5, 34(2):103-105.
- [4]吕方, 梅琳. “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J]. 学海, 2016, (4):76.
- [5](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97-98.
- [6]黄文杰. “95后”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现状——基于部分大学的实证调查[J]. 东南传播, 2020, (2):117-118.
- [7]张爱军, 王富田. 网络民粹主义: 反话语表征与消解策略[J]. 理论与改革, 2020, (1):161.
- [8]瞿葆奎主编. 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19.
- [9] 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M].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5:180.
- [10]龚群. 译者前言[A].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德性之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17-22.
- [11]陈开林. 麦金太尔德性论及其德育意义研究[D]. 南京师范大学, 2011:32-35.
- [12]陈真. 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思想述评[J]. 江海学刊, 2005, (6):35-36.

责任编辑:肖第郁